



香港新诗发展史

犁 青 / 总主编





H O N G K O N G

香港新诗发展史

P O E T R Y

总 主 编 划 / 犁 青
总 策

分 卷 主 编 / 朱寿桐

第一卷撰稿人 / 梁笑梅

第二卷撰稿人 / 张冬明

第三卷撰稿人 / 张志国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新诗发展史/犁青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250-1

I. ①香… II. ①犁… III. ①新诗—诗歌史—研究—香港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812号

责任编辑 王 晓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常 虹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52千字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16

印 张 43.5 插页3

版 次 2014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50-1

定 价 1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绪论:汉语新诗发展格局中的香港新诗	1
第一卷 新诗的突围与新诗地位的确立	11
第一章 新文学与新诗的突围	19
第一节 萌发期的香港新诗	19
香港文坛文白消长和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香港新文学兴起的标志——	
香港诗人对新诗格律等问题的探索	
第二节 新诗界的香港音响	27
《香港》:闻一多与《七子之歌》——《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	
迅在香港的讲演——《香港之夜》:王独清的香港歌唱	
第三节 次源性传播:香港早期新诗的媒体运作	32
香港早期新诗建设首先在次源性传播意义上引介了新诗理论——《小说星	
期刊》在次源性传播的意义上进行最初的新诗建设	
第四节 寂寞的歌吟:拓荒者的初探与求索	39
李圣华——L. Y. ——陈灵谷——吴其敏——李心若	
第二章 香港新诗形象的初立	46
第一节 都市放歌:人性之塔建民族之城	46
诗人开始面对现实,接受现实,反映现实——香港都市诗盛载着各种复杂的	
思潮	
第二节 新诗刊物与社团的互动效应	53
香港诗人与内地诗界的密切联系——众多报刊媒介与香港新诗的传播场域	
第三节 诗心的连环:加盟《现代》的香港现代诗人群体	58
《现代》在香港诗界的影响与回响——李金发对香港诗人的激励与扶持——	
香港现代诗人群体(侯汝华、林英强、路易斯、陈江帆等)的创作实践	
第四节 夜莺在自己的时代:本土守望者的新诗实践与呈示	74
侣伦——刘火子——李育中——易椿年	
第三章 南来诗人主阵期:岛入时代的新潮	87

第一节	跨界书写：内地诗人南来的高潮	87
	香港成了中国新诗与诗人们的战时走廊——香港抗战诗结合内地影响与本土精神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第二节	出版界的“新”气象	98
	1938年至1941年间的香港出版业蓬勃发展——戴望舒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茅盾与《文艺阵地》	
第三节	来自“诗国”的“争吵”	108
	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新式风花雪月”之辩	
第四节	规约的选择：抗战诗题的主潮及其衍生诗语	113
	戴望舒——杨刚——鸥外鸥——蒲特——徐迟——陈残云——彭耀芬	
第四章	作为新诗重镇引领时代的诗潮	143
第一节	诗性的承续：南来诗人与本土诗人再度联袂	143
	香港新诗在此阶段完成了自身形象和地位的确立——香港的诗歌运动再次勃兴	
第二节	香港俨然成为左翼诗歌运动的重要阵地	153
	《诗人节宣言》——香港左翼诗歌完成了它的政治功能	
第三节	文化漫流中穿越的诗魂：其他重要诗歌事件	158
	方言诗运动——新诗的散文化与纯诗化	
第四节	多声部的交响：行吟者的浪漫诗心及其现实关怀	164
	臧克家——陈芦荻——柳木下——邹荻帆——黄宁婴——袁水拍——吕剑——犁青	
第二卷	汉语新诗艺术的时代标杆	189
第一章	香港诗坛的第二次突围	191
第一节	政治势力与非文学因素的介入	191
	各方势力在香港的角逐——美援掀起的“绿背文化”	
第二节	诗坛的寂寞	198
	与内地的疏隔导致诗坛寂寞——政治势力干预下文学的不良生态——香港市民日常消遣方式与诗歌的阅读市场	
第三节	诗坛的复苏	204
	《文坛》与香港新诗——《人人文学》——《中国学生周报》及其文学影响——《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的副刊——《海澜》	
第四节	多重政治干预下的突围	213
	苦难中的温暖——“燕语”呢喃——在“时间的去处”感悟人生情怀——“去	

第二章 承前与超前的新诗探索	227
第一节 承先启后的新诗诗体探索	227
对十四行诗、豆腐干体等诗体的探索——在诗的节奏上呈现力度——以口语化、民歌体为香港写实	
第二节 现代诗的先锋性探索	241
浪漫主义开出一朵新鲜而短暂的“诗朵”——香港新诗发展史上现代主义新诗的开端:《文艺新潮》	
第三节 与台湾的现代诗对流	255
留学、办刊、出版、翻译成为港台新诗对流中最流动、卓有成效的载体——1960年代香港现代诗的发展以及与台湾现代诗的互动——不在场的诗人吴兴华	
第三章 现代诗歌的艺术开拓	267
第一节 别开一面的现代诗人	268
“在火灾里建造自己的城”:从对原乡的怀想到对原乡的企盼——从浪漫的个人情怀到苦闷、破碎的现代感觉——在时代的荒原中寻找精神皈依——“爱人”与“近仁”——悟禅,悟家国情怀与香港意识——“纯境”·实境·“纯”境	
第二节 存在主义的影响及其他	295
一场颓废的生命追逐游戏——以古典为貌,以现代为魂——孤独的“猎者”与轮回的“火凤凰”——“在时间的压力之下”	
第三节 西方现代诗歌理论的介绍	312
几种主要刊物对西方现代诗歌或者理论的介绍——几位主要译介者的译介工作	
第四章 香港新诗的运作	322
第一节 新诗的社团运作	323
青年文社的风起云涌——各种文学奖项、比赛——新诗的集体运作方式——社团运作的意义——“素叶”诗人群及其他代表性诗人——“诗作坊”影响的诗人群	
第二节 诗歌杂志的兴盛	355
诗歌杂志以及刊物的兴盛——几种左翼文学刊物及诗人——“‘诗风’诗人群”	
第三节 流徙与漂泊中的新诗运作	391
在“海外”唱响的时代激情——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跨艺术的诗性书写——漂泊与停泊:一位生命体验者和沉思者——香港“三叶”诗人	
第五章 香港新诗形象与文化品格的铸成	410
第一节 香港新诗特产:香港都市诗歌	411

	都市生活的底层叙述——多角度、多层次的都市诗——在生活的细节里隐现都市影像——现代诗歌的探索者——展演平凡而悲凉的城市生活及对自然生态的追寻	
第二节	新诗反哺与精神还乡:歌咏大陆与祖国	431
	新诗反哺——精神还乡、歌咏大陆与祖国——保钓运动及当代爱国诗歌	
第三节	多元文化基因的香港新诗	445
	“中国现代诗”——踏浪归来的诗人——漂泊的“紫风书”——“沙爹诗人”	
第四节	香港粤曲及流行音乐的兴起	456
	关于香港粤曲与流行音乐——黄霭词作及其世界性影响	
第三卷	汉语新诗走廊与长廊	461
第一章	新诗的“准体制”运作	462
第一节	由民间文社到大规模的“联合会”	463
	各种“准体制化的组织”:香港新诗面临正规化的情势——新诗“准体制化”运作中的理论论争	
第二节	体制力量的进入	478
	政府创作奖的设立——政府主导的文学活动——香港文学节的创立	
第三节	权威期刊的运作	489
	《香港文学》杂志与香港新诗的发展——《八方》丛刊与香港新诗——边缘的《文学家》与“香港诗选”——专业诗刊的发展	
第四节	体制内外的香港诗人群	507
	在“时间的磨坊中”——技惊四座的“捕鲸之旅”——从《惊发》的机智到《剥柚》的思辨——在爱的旅途中寻觅“另一空间”——诗刊运动的弄潮儿	
第二章	各地诗人的集散地	541
第一节	“归来”的诗人群体	542
	带着“香港情结”归来——鸥外鸥风潮——古典与现代的回归	
第二节	新的“南来”诗人	557
	旧式文人的“现代绝句”——把汉俳推向世界诗坛——“最临近地狱”的嘲讽者——融化古典,锻造现代	
第三节	客居香港的诗人	569
	香港十年的北望及静观——“半天卖沙爹半天生产诗”——澳门的“离岸诗人”	
第三章	汉语新诗的世界性运作	585
第一节	新诗与两岸文学界的破冰交流	585
	沟通两岸三地的诗歌使者——两岸四地以及海外诗人的纽带	

第二节	建构汉语新诗的组织形态	587
	国际诗人笔会——当代诗学论坛机制——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与香港散文诗学会——中华文化总会及诗朗诵活动——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与汉语新诗发展	
第三节	新诗的世界性梦寻	597
	诗意行走的“大地诗使”——香港过渡时期的晴雨表——擎起“爱与恨的旗帜”——在香港走向成熟的诗人——女性诗人的寻梦秘语——多元追求的城市诗人	
第四章	从新诗走廊到新诗长廊	630
第一节	各种诗歌探索的继续展开	630
	犁青的立体诗与时事诗——长诗:传统与探索——香港的后现代诗——网络诗与《诗网络》——夏马、陶然的散文诗——香港回归诗词与爱国歌曲	
第二节	新诗的离散与诗人的离散	667
	游走加拿大的歌者——澳门风景的镌刻者与行吟者	
第三节	香港与新诗发展可能性	681
	死亡危机与突围意识——“汉语新诗”概念的理论贡献——与国际对话的香港诗坛	

绪论：汉语新诗发展格局中的香港新诗

香港新诗的发展成就卓荦，可以从许多方面展开历史的阐述和学术的论证。作为大中华文化圈的一个特定区域，香港具有连接两岸四地，沟通东西方文化的特别优势和特定使命，因而在汉语新诗的历史发展中必然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历史地学术地总结香港新诗的历史和现状，并不仅仅是为汉语新诗的这一块地勘立界碑，描画边沿，而需要在整个汉语新诗乃至汉语新文学的发展总势和全貌中确认香港的地位及其价值功能。本书的基本学术定位即在于此。

汉语新诗原称新诗，也叫白话诗，一般认为以胡适后来收入《尝试集》中的尝试体诗歌为开端，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学术表述上常以“中国现当代诗歌”为学名。但考虑到“中国现当代诗歌”应该不能排除这一时期的旧体诗歌，觉得还是用回“新诗”概念更为妥当与明确；又因为“中国现当代诗歌”更不应排除同时期在中国范围内的其他民族语言的诗歌，故而须点明“汉语”，运用“汉语新诗”的概念。

汉语新诗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圆满地解决了现代汉语与诗性表述之间的技术问题，准确地摸索出时代情绪和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写途径，并且在与外国诗歌的不断交流中积累了丰富的审美经验。香港新诗以自己的优势条件和独创精神，在诗歌体制的建构，新诗现代品格的定型，新诗对当代市场社会因应能力的提高，以及表现出独特的南国风貌等方面，为整个汉语新诗的发展和成熟建立了殊勋，值得我们从历史的和学术的角度进行总结。

一、新诗运作机制的完备

汉语新诗之所以能够从势力庞大、积累丰厚的传统诗歌中突围而出，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得到长足的发展，是因为几代现代诗人在创作方面不断付出大胆的尝试和卓越的追求，也因为它在历史运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新诗运作的成功，香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因为香港新诗界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迄今最为完备的新诗运作机制。

所谓新诗运作机制，是指帮助、激发、鼓励新诗创作及其影响扩大的一系列外在

的条件设置和制度创新。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新诗运作机制还算相当传统,主要是新诗刊物的创办,新诗集的出版,新诗理论的探讨,新诗评论的推进,还有伴随这些内容的各种诗歌运动的掀起。进入到汉语新诗的香港时代,其运作机制面临着巨大飞跃,最突出的原因是,香港以其特别开放的科技、文化和社会环境,几乎取得了与西方社会同步现代化的时代机遇,在大中华文化圈中率先进入令人目眩的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媒体的高度发达推动了香港这个自由世界文学和诗歌社团的空前活跃,媒体的发达以及社团的活跃与不断升级,催生了各种诗歌导引和激励机制的形成,于是各种倡导机制、运行机制和奖励机制应运而生。这样的机制在促进新诗创作和评论方面又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早在1920年代,当香港新诗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香港与新诗有关的媒体就开始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路子,从而孕育着这个地区新诗媒体发展的无限前景。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发祥地尚处在新旧文学争持不下,你死我活的意气状态,香港的文艺媒体却出现了“新旧混合”^①的崭新局面,这预示着香港媒体环境的宽松与包容气度。稍后,以《诗页》、《今日诗歌》为代表,香港的新诗刊物逐渐繁盛,仅在1930年代就出现了十数种,且不包括更大量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如《红豆》与《南风》等,刊载新诗的篇幅占着较大比例。1940—1950年代,香港的新诗媒体依然繁荣发达,虽然像《诗朵》这样的纯粹性诗刊仍不多见,大部分刊物如《人人文学》、《中国学生周报》、《海澜》、《文艺新潮》等都是包含诗歌的文艺性杂志,但新诗创作的发表和新诗运动的展开一直是它们最鲜亮的内容,其中《中国学生周报》的《诗之页》栏目坚持了二十多年,直接培养了超过两代的汉语诗人。到1970—1980年代以后,新诗的专业性刊物此长彼歇,甚是活跃,其中不乏办刊历史超过二十年,即便是异地出版也能顽强坚持的纯粹诗歌刊物,如《当代诗坛》等。与此同时,诸如《香港文学》在内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仍以诗歌创作和评论为主打内容。由于刊物登记、书籍出版机制的高度自由,香港在历史上几度成了华人世界诗歌媒体最密集最活跃的地区,这样的条件和机制也吸引了香港以外的新诗作品的成批涌入,如澳门新诗人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香港发表为其主要途径,特定时期的内地诗人和台湾诗人也将在香港发表作为其第一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这客观上托显了香港在汉语新诗发展史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香港新诗媒体的活跃与发达,同香港新诗社团的兴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般而言,媒体自由的地方同样存在着结社自由,社团活动的频繁很容易导致媒体的盛行。香港较早就是文社丛生、诗社林立的区域,诗歌社团的兴盛催生了诗歌刊物的发达。据研究,香港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是“岛上社”,与之相伴的《伴侣》培养了香港第一批新文艺作家和诗人。这个社团曾试图编辑一本名为《岛上草》的作品全集,又在

^① 吴灞陵:《香港的文艺》,《墨花》1928年第5期。

《大同报》副刊刊出了“岛上”周刊。1929年还创刊了纯文学杂志《铁马》。文学社团的存在方式常常就是这样,通过出版各种刊物和丛刊显示自身的价值。1934年,纯粹的诗歌团体出现在香港,那是被称为“同社”的团体,后来又出现了“十月诗社”,它们都以出版相应的诗歌刊物以显示自身的存在。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陷,许多内地作家和诗人纷纷南下,香港的文学和诗歌出版物空前繁荣,原发行于上海的《大公报》、《立报》、《申报》相继在港复刊,另有《星岛日报·星座》以及《时代文学》,还有新创刊的《国民日报》,这些报刊都成为香港抗战诗歌的重要园地。

1950年代,香港出现了以大专学生为主的文社诗社,如“阡陌”、“苑风”、“盟心”、“同学文集”、“撷星”、“鸿雁”、“学苗”、“凯旋”、“谷风”、“海外青年”等,并进一步形成了文学结社的风气。他们的主要活动同样是出版自己的社刊。更大规模的文学社团运动出现在1960年代,在人员构成上演化为以中学生为主,在数量上,保守估计也在二百个左右,文社活动频繁,出版社刊更繁密。这种文学和诗歌结社活动的风气此后一直盛行于香港,自发的文社诗社的发达其结果便自然演化为文学和诗歌组织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文社诗社健全了香港的诗歌体制。1960年代中期,“香港文社联会”的出现,标志着香港文学和诗歌社会化体制的建立。此后,各种作家诗人联合会的体制逐步建立。在高度体制化的社会环境中建立作家、诗人的社会体制显得非常容易,可在自然组合状态之下,这种社会体制化的文学和诗歌组织殊为不易。

香港文学和诗歌的社会体制化带来了诗歌运作的一系列机制。如征集与奖励机制。1961年年初由阡陌文社开展的征文比赛,是香港文学界征文奖励活动的重要起点。稍后,《中国学生周报》、《青年乐园》、《星岛》、《华侨》等杂志都曾举办过征文比赛。1972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为庆祝创校60周年,举办大型活动“文化节”,设立了“青年文学奖”并坚持逐年举办,历40年,至今不辍。1979年,香港市政局创办了每两年一度的“中文文学创作奖”,旨在“鼓励本地文学创作及提高市民对文学的兴趣”^①。这是政府主办文学和诗歌奖的开始,也是香港文学与诗歌走向社会体制化的重要标志。

围绕着诗歌征集、诗歌评奖等活动,香港文坛还开启了各种诗歌讲座、诗歌培训机制,为本地诗歌的发展和创作的活跃注入了新的活力因素。这样的体制化意味着借重社会乃至政府的力量促进文学和诗歌发展的一种自觉性。至此,香港的文学与诗歌体制在一种自觉构建的状态下较别的区域更加完备,更加健康。

正是由于有了完备而且健康的文学与诗歌运行机制,香港便理所当然地充任了两岸四地作家诗人的桥梁之地或纽带之所。1980年代初,犁青定居香港,明确提出

① 《香港文学展颜·序言》第八辑,第1页,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2。

“为海峡两岸构搭诗桥”的意向^①。有人因此将犁青称为沟通两岸四地的诗歌使者。同样能担得起如此美誉的还有傅天虹,他于1980年代初移居香港,同样致力于两岸诗界的沟通。1990年创办的“当代诗学会”,更是成为两岸四地乃至整个华人诗界的共有组织。在这方面犁青也很有建树,他于1987年12月成立了全球17个国家地区约二百名作家、诗人参加的“文学世界作家诗人联谊会”,此后又成立“国际诗人笔会”,将联络的范围扩大到汉语诗歌以外的区域。

并不是说这些跨地区甚至跨国的诗歌组织运作得毫无瑕疵,或者效用无穷,但香港却是整个华人世界最先最自觉也最有条件进行世界诗歌运作的地区,这不得不归功于香港特殊的国际地位,香港特有的自由开放的条件,更重要的是,香港日益发展成熟起来以至臻于完备的诗歌运作机制。这种诗歌运作机制不仅大大提高了香港的诗歌地位,更重要的是,为汉语新诗的融合、发展以及走向世界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二、现代主义汉语诗歌的复兴基地

香港社会和文化的开放性以及现代性,决定了它的诗歌能够迅速接受西方潮流,这就决定了香港诗歌在汉语新诗发展中的另一种特殊地位。在台湾和大陆都热衷于意识形态的表现,对西方现代诗潮保持警惕甚至敌意的时候,香港作为自由港和西方文化的东方集散地,则能够非常顺利地接受西方现代诗潮的影响,非常便当地发扬新文学和新诗发展中现代主义的传统因素,因此,尽管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经登陆中国,但真正趋于定型,还是在1950年代以后开放的香港。香港真正为汉语新诗厘定了基本诗型。

兴起于香港、台湾的现代主义汉语新诗,与1930年代的现代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台湾的纪弦于1956年在台湾宣告倡导现代派的“现代诗”,香港的马朗差不多同时出版了《文艺新潮》,发动香港的现代主义诗潮。而他们都是1930年代及其后上海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他们在不同的空域倡导类似的现代主义诗歌,不约而同地唤起了二十多年前曾风靡中国的现代主义诗风。这当然得益于西方思潮的直接刺激与启发。如果说台湾的现代诗歌运动还不断受到乡土派文艺以及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干扰,那么,香港的现代诗运动则在兴起以后基本上占据着诗坛的主流位置,为汉语新诗的“现代化”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香港的现代主义诗歌与台湾的现代派诗歌运动遥相呼应,互为支撑,共同在汉语这一相对于现代主义艺术而言属于较为陌生的诗国扩充了诗学的基壤。自1950年代以后,香港诗坛风格多样,诗歌体制相当自由,但现代主义诗歌一直在这个区域占

^① 犁青:《韧性亦任性的追求》,《山花初放》,第126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

据前沿甚至主流的位置。马朗、贝娜荅、崑南、李维陵、卢因等一代现代派诗人为香港的现代主义诗歌奠定了基础,到1960年代,刘以鬯更以现代主义诗学的倡导与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自1950年代以后,香港多家有影响的文学、诗歌刊物都加入了现代主义的介绍和倡导,《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文艺新潮》、《诗朵》、《新思潮》、《香港时报·浅水湾》、《好望角》等都曾刊载为现代主义诗歌张目的文章,以及大量现代主义诗歌的实践之作。不仅香港新锐诗人借助于这些平台发表自己的现代主义歌吟,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实践者如痖弦、余光中、覃子豪、周梦蝶、白萩、洛夫、罗门、琼虹等也借助于香港的这些文学媒体进行现代主义诗歌的耕耘。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的创作显然对香港现代主义诗潮有较大的鼓舞,以至于有人认为1960年代香港诗坛曾刮起过“小小的‘痖弦风’”^①,与此相联系,香港文坛毕竟长期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台湾现代主义诗人,应该是整个汉语诗坛最引人注目的现代主义创作基地。

香港现代主义诗歌之所以能够最有力地承担起赓续1930年代现代派文学传统的历史重任,是因为香港的一些现代主义倡导者从现代派绘画等邻近艺术那里获得了深深的启发。本来,现代主义文学和诗歌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绘画以及表现主义戏剧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现代派绘画艺术有着深切认知的艺术家往往非常容易理解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和诗学原则。王无邪正是以这样的背景加入了香港现代主义诗歌的倡导,崑南的诗正是如此充满着色彩的炫动:“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蓝色的,灰色的,白色的/奔来后又立即驰去/动的,静的,光的/暗的,凹的,凸的/奔来后又立即驰去……”(《布尔乔亚之歌》)那色彩的调动和感应完全出于现代画家的感性。

从传统的诗歌艺术感兴中寻求时代的灵感,将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之花在与传统艺术的结合中绽放出来,这曾经是戴望舒、穆旦等杰出诗人在1930—1940年代的精彩开创。将这样的开创发扬光大,从而使现代主义汉语诗歌在香港体现出更加厚实更加成熟的形态,是香港现代主义诗人的一大贡献。诗人羁魂的《蓝色兽》诗辑中收录了带有古典倾向的现代诗。《沕》、《劫》、《觉》、《后》等诗带有禅语的意味。其中的《沕》从广府生活中“饮茶”的场景联想到“博士是茶/生活是一盅两件”——“如此刘伶刘伶的陶令/莫赋闲情——/不准吐痰呃随地”,在1960年代即穿越古典的情绪体现出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诗性,用诗人自己的话说,达到了“很‘超现实’的‘现代’加很‘诗词’的古典一同醇酿出来”^②的境界。

香港现代主义诗歌从1950年代开始就逐步走向正常路径。如果说台湾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还需面临着乡土文学的强劲制约,大陆的现代主义更是在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数度包围中曾经步履维艰,则香港文坛的相对自由决定了现代主义诗学

^① 郑树森:《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新诗》,见黄继持等著:《追迹香港文学》,第47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② 羁魂:《自序》,《山仍匍匐》第2页,香港:山边社,1990。

道路的通畅和顺利。在大中华地区,只有香港的现代主义诗歌在一定时间段内能够走着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相协调的步伐,也只有在香港,几乎各个历史时期打头阵的都是现代主义诗歌。而且正是香港,凭借着都市化通俗化的诗歌发展惯性,较早走向了通往后现代主义的路径,包括犁青的图像诗的尝试,其力度和影响都超过台湾类似的实验。这种后现代主义尝试可以追溯到1960—1970年代的刘以鬯的实验。现代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文艺思潮,在开放的香港更有其发展的条件和空间。香港汉语新诗界非常出色地承担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和命运,他们以较为轻松的实验心态复兴了1920、1930年代在中国文坛已经初成气候的现代诗歌传统,并且与战后西方世界急速发展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艺术相结合,在较为前沿的诗学世界发挥了汉语的魅力和作用,造就了汉语诗歌的另一种辉煌。

三、都市诗歌与南国情愫

不同语言的诗歌抒发着不同民族的情愫,正像不同语言的小说记录着不同民族的经验。汉民族的时代情绪通过汉语诗歌得以承载,得以抒写,得以传诵,现代汉民族的现代情愫就需要汉语新诗完成这样的承载、抒写和传诵任务。当然,真正民族情绪的吟诵并非空洞的概念化的干号,须是具体的甚至是与个体体验相联系的情感内涵的抒发。香港新诗通过对香港这个特殊的区域诗兴情感的抒写,为汉语世界保存了卓然独异的都市诗歌和南国情愫。

香港历来是一个市场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这里的文艺常常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市场化的痕迹。这样的区域文化特征决定了香港新诗自产生之日起便呈现出与其他区域完全不同的态势。当其他区域的汉语诗歌都小众层面进行实验和探索的时候,香港诗歌则较早走上了通俗化、市井化道路。1920年代末,《伴侣》所具有的都市文学色彩,主要体现在通俗化的路径。这种通俗实际上是市井的通俗,而这市井体现的是浓郁的香港风味和南国风味。1920年代末,《伴侣》所具有的都市文学色彩,主要体现在通俗化的路径。这种通俗实际上是市井的通俗,而这市井体现的是浓郁的香港风味和南国风味。诗人们摹写着柏油路,徜徉于“Bar的门前”^①,诗意地展示着热烈而开放的南国风情。

后来,随着市场化对文学干预的深化,纯粹的诗艺发展受到一定的阻滞,但同样是市场化文化的催动和影响,电影音乐和粤语流行歌曲的流行又一次激发起汉语新诗的勃兴。特别是1970年代,温拿乐队、许冠杰、黄霑等音乐人直接培育了香港粤语流行歌市场,这使得香港作为诗歌的都市更具有自身的特征。一般认为1974年香港

^① 洛沙:《街头歌人》,原刊于1934年11月18日香港《南华日报·劲草》。

“无线”电视剧主题曲《啼笑姻缘》的出现,标志着香港社会普遍接受粤语流行曲的开始。此曲面世并流行之后,粤语歌曲与诗歌取得了几乎同样尊贵的地位,“连大学校长宴会后小提琴演奏,也拉黎小田作曲的《人在旅途洒泪时》娱宾。‘粤语流行曲’开始名符其实,真正流行起来”^①,更真正在文艺的殿堂登堂入室,成为香港汉语诗歌走向世俗化和普及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是在通俗化的文化气氛中,香港诗坛出现了所谓“钟伟民现象”,这一现象体现出通俗文化与诗歌之间博弈发展的某种趋势。

通俗化的文化运作使得诗歌放下了往日的矜持,开始以都市色彩浓烈的热忱拥抱世俗风景。于是王心果吟唱《股市》,说是“三千八百点非常可爱/四千大关更加美丽”,然后联想到梦遗,亢奋,勃起等等猥亵的意象,以市井恶俗颠覆了诗歌惯有的神圣,然而这正是走向后现代的都市诗歌常有的态度。

汉语新诗在1980年代以后或隐或显地呈现出通俗化、口语化的热潮,包括内地一度相当走红的汪国真现象。这样的诗歌潮流清楚地表明,经过一个甲子的运作,汉语新诗已经达到了语言表述得心应手的境地。人们可以通过现代汉语,随心所欲而不必咬文嚼字地表达属于一个时代的诗性感悟。香港这方面的表现稍微滞后,但以蔡丽双的朗诵散文诗集《新季》和朗诵诗集《海鸥》等为代表,同样呈现出汉语新诗在香港的这种都市气息。

香港的都市生活经验及其所激发的文学情调,为汉语新诗的美学世界增添了绚丽多姿的南国风情。使人们常常吟唱南国的芭蕉,还有殖民文化和市场文化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景致。早在抗战后期,对香港在现代都市发展中的快速变化,诗人们就表达了这样的感受:“没有一座山永久,/没有一块冷落了的土地永久,/没有一片房子永久,/标贴着‘To Let’的招子不过一小时,/永久的只有银行的地址!”这便是快速而畸形地发展着的香港都市的风景,它带着一定的诗意,带着一定的力度,也带着无奈的感叹和怅然。如果说这种快速变化的感叹很显然出自本土香港诗人的笔下,则外来诗人感叹的是南国风景中的孤寂与痛苦的体验。力匡的《重门》意识到“南方的冬天没有霜雪,/没有人在寒风里战栗哆嗦,/路边没有秃顶的梧桐,/也没有人在深夜叫卖糖葫芦和梨果”,这是一派异地,于是,作为“这岛上的旅人”,却“孤独寒冷得不到暖和”。这不是一般的去国怀乡之思,它包含着对于香港这个南国都市的情感理解,其中传达的都市文明气息具有强烈的区域色彩。

香港诗人对都市里的一切风景都乐意去歌吟,同时也进行诗性的反思。陈德锦的《观景电梯》对香港都市黄昏景象做了如此精细的诗的研磨:“如果世界在旋转中已走到黄昏/我们不过是落在它时间的磨坊中/慢慢被磨碎,被掉进黑夜的秕粒/而这

^① 见黄霭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

一家,那一户,暖烘烘的灯火/终会变成四壁洞黑的暗室……”这是在观光电梯中审视的都市风景,这是在现代主义感兴中体味出来的香港意趣,有新异,有酸涩,有精彩,有痛楚。

蔡炎培被人们称为“写马经的诗人”,而这正是香港新诗领域中的一道特别的风景。尽管他用马经的专业术语来评诗曾被人们诟病,但他的赌马诗确实是别具一格的都市诗歌风景。他关注赌马人一赌而博千金的美梦常常被“捉不住的马蹄”搅碎。对于香港下层社会不幸的风景,诗人们也充满了披露的热忱。诗人阿蓝一直在沉重的生活负担下坚持写作,视野往往集中在下层社会的艰辛。他注意到“有些街角,却有很多人依然默默地生活,他们不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日出日落在酷寒的冬天,日光照的很少。为了省点用细火数的灯泡,忍受阴沉沉的照明。混浊的空气,挤迫的住所,节衣缩食的生活下去……”在这样的强烈感受中他写出了诸如《卖报纸的老婆婆》之类香港风景,这同样是香港都市诗歌的一抹新痕。

香港的山山水水都是中华大地上的风景,香港的诗人们用诗笔描摹香港的南国景象,其实就是在用汉语表达中华风景中特异而亮丽的一段。南来北往的诗人在此驻足之时歌颂香港,久居香港的本土诗人以一种挥之不去的本土情结歌吟着香港的南国风情,抒写着香港发生的种种故事和都市化的社会行迹。这里有美丽,也有伤痛,有风情,也有苦情,有魅力,也有人生的行路难。香港的汉语新诗将所有这些都呈现在世人面前,实际上是面向世界完成了一个特定时段和特定区域的汉语情愫的诗性表达。

四、走向世界的汉语新诗

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作为概念,最主要的价值体现在一种世界性的观照。自从汉语文学进入新文体,在新文化语境中崛起以后,其世界性的观照便是它存在的依据、发展的动力和价值的支撑。只有在世界化的格局中,审视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才有了新的价值体系,才有了新的传统内涵。香港始终处在面向世界的开放状态,它能够而且应该承担起汉语文学和汉语诗歌走向世界文学的重大历史责任。

香港由于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一向对世界文学的翻译介绍非常重视。从清末的《小说世界》到《新小说丛》,几乎所有的文艺期刊都有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或文学论文的传统。著名的《红豆》杂志更是将此地的翻译文学推到最高峰。翻译文学的传统打开了香港诗人的世界视野,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批评因而较之其他华人区域更加体现出广阔的世界胸怀,这为汉语新诗的世界品质的获得和保持做出了贡献。

香港的诗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走出了一条由身边关怀向国际关怀的诗歌道路。即便是身边关怀的诗歌,在香港也格外拥有世界新诗潮的影响。这是指在这个区域

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诗风的率先垂范。徐许在香港所写的《时间的去处》、《已逝的青春》等诗歌即几乎保持着与1950年代世界现代诗潮同步的身边关怀：他观察到“浮肿的云”，“颤抖的风”以及“不眠的星星”，慨叹“没有美，没有梦”，“没有那千古不变的爱情”，当然也就没有了青春。只有都市的“红丝绿绡”在“伪装那已逝的青春”。这是一种充分内视的人生感兴，它与众多香港都市关怀的诗歌一起，构成了充满“现实主义”意味的香港新诗传统。与此同时，香港诗歌在世界关怀的意义上别开生面地建立了新的传统，那就是将世界纳入诗人的视觉和诗感，将诗的表现漫游在遥远而广漠的国际空域。

一开始，香港诗人的这种世界关怀的写作，是在以反战的情怀呼喊和平。1990年代初，郑镜明的诗歌凸现了这一重要主题。他陆续发表了《白宫权力转移的那一刻》、《美国首都贫富悬殊》、《大选前的美国众生相》、《与南斯拉夫士兵一起抽烟》等诗，展现了诗人在人类主义情怀下对于世界和平的祈求和关注。尽管他的关怀仍然带着传统的人道主义气息：“几天后，也许你不知捍卫什么/追逐子弹，爱上了焦土和尸臭/偶尔蜷缩在潮湿的战壕里”（《与南斯拉夫士兵一起抽烟》），但这是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它超越了己身关怀、身边关怀，将诗歌善良的触角伸向了无边的世界。

不可忽视的是，1990年代中东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爆发之时，华人世界都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日益强化的信息系统彻底拉近了中国几乎所有地区与世界的距离。然而，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的诗人来说，1950、1960年代那种胸怀世界革命、支援亚非拉的政治性世界意识被挫之后，已经很少人想到世界战事可以成为诗的题材。除了时事评论家之外，包括诗人在内的几乎所有文人都对世界时事采取了审慎的回避或漠然对待的态度。台湾诗人似乎从来就没有燃起对于世界局势的政治热忱，这样的题材对于他们而言也难以处理。只有香港诗人例外，他们将属于诗歌的人道主义情感，属于美学的和平意识，毫无保留地投射在万里之外的局势混乱地区，为那里的民众、士兵以及一切正义的对象由衷地歌哭。这样的世界意识的诗性表现，使得汉语新诗在当代世界的正义呼喊中免于缺席，使得汉语新诗在世界性的歌咏和抒写中发挥了自身的价值。如果说在政治领域各个民族都须争夺一定的话语权，则在诗学和文学领域，汉语也应该争得自己的话语权，尤其是在对人类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的世界事件面前。香港诗人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他们素来就较为鲜明强烈的世界意识较多地摄入世界时事题材，从世纪末的中东战争和科索沃局势中提取诗兴。

犁青是这方面的代表诗人。他曾借参加在以色列举行的第13届世界诗人大会之机，考察了以色列与叙利亚交界的山岭，写出了极富有语言冲击力甚至视觉冲击力的《石头——为以色列写真》等系列诗作。“在以色列的石头上”，诗人看到鲜血和眼泪，被无辜杀害的有微笑着的天真无邪的少年，有揽抱着惊惶学生的老师，居然还有“看望着初生婴孩同时被砍杀的母女”……惨绝人寰的罪恶发生在文明的当今，鲜明